

# 论蔡邕碑颂中《周易》典故的运用

赵德波

(广州大学 俗文化研究中心, 广州 510006)

**摘要:** 作为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蔡邕与当时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东汉末年《易》学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蔡邕碑颂中运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并且能够根据碑主及表现事象的不同有所甄别。蔡邕碑颂中所用的《周易》典故,继承了《易》经的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同时又反映出经学昌盛期尊师重教的风尚。蔡邕在碑颂中所用为《费氏易》,与当时的经学走势合拍。

**关键词:** 蔡邕碑颂;《周易》典故;社会风尚;《易》学走势

**中图分类号:** K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 (2013) 05-0144-06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硕学鸿儒,在文学和经学方面均有精深造诣。由于目前存世的有关蔡邕经学传承的文献资料较少,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思想和文学创作层面,从经学角度切入者较少。然而,蔡邕的经学背景对其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蔡邕存世的作品中碑颂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碑颂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了很多经学典故,碑颂的行文具有经学典籍的风格特征。本文即以蔡邕的碑颂作为研究对象,以其碑颂中的《周易》典故作为切入点,进而透析汉代经学与经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蔡邕是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大师。蔡邕传《易》,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未将蔡邕列为《易》学传人。然而钩沉史籍可以发现,蔡邕不仅治《易》,而且在《易》学传播上作出巨大贡献。首先,东汉末年五经舛乱,蔡邕“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颙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sup>[1]990</sup> 蔡邕主持校定六经工作结束后,以小字八分将校正的经文书于石碑,因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经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sup>[2]475</sup>。这次对经学典籍的勘定,在经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而蔡邕作为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功不可没。其次,蔡邕作品中涉及到大量的《周易》典故。这些典故或是

直接套用《周易》语句,或是化用《周易》寓意。蔡邕能够根据表现事象的需要对《周易》典故进行选择 and 甄别,而这些《周易》典故运用也是对《周易》的传播。除了本人治《易》之外,蔡邕还和当时重要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 1. 与杨秉、杨赐的关联

杨氏家族是东汉后期的名门望族。杨震、杨秉、杨赐祖孙三代都曾位列三公。同时杨氏家族又是著名的经学世家,世传欧阳《尚书》。《后汉书》卷54《杨秉传》记载:杨秉字叔节,“少传祖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秉子杨赐和蔡邕同朝为官,如上所述,他曾参与校定六经文字。作为《易》学传人杨秉之子,且有着校定六经的学术经历,对《周易》自然不会陌生。唐晏即把杨秉、杨赐同列为汉代《京氏易》传人。

蔡邕和杨赐曾同朝为官并且交情甚笃,杨赐之父杨秉去世之后,蔡邕撰有《太尉杨秉碑》。杨赐去世之后撰有《司空文烈侯杨公碑》、《文烈侯杨公碑》、《汉太尉杨公碑》、《司空临晋侯杨公碑》等四篇碑文。据此可窥二人交情之一斑。

## 2. 与崔瑗的关联

崔瑗字子玉,《后汉书》卷52《崔瑗传》记载:“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由此可知,崔瑗为《易》学传人无疑。实际上,崔氏家族亦为东汉后期的名门望族和经学世家。崔瑗祖父崔篆著有《周

收稿日期: 2012-11-20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基金资助项目(GD12XZW06);广州市属高校科研计划项目重点课题(2012B067);广州大学青年博士基金资助项目(ZDB1-1001)

作者简介: 赵德波(1982—),男,讲师,博士,E-mail: qfzdb@163.com

易林》64篇。其父崔骃,《后汉书》卷52《崔骃列传》记载:“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

崔瑗和蔡邕之师胡广交情甚笃,而且正是在胡广、窦章等人的荐举之下,迁为济北相。《后汉书》卷61《左周黄列传》赞论中写道:“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此虽为贬损之词,但从一个侧面证明四人关系绝非一般。而蔡邕作为胡广的得意门生,和崔瑗有过交往也是自然之事。另外,据邓安生先生考证,“济北与陈留邻近,邕少时或尝从崔瑗问学,因与崔寔游,故及崔夫人卒,乃为之作诔。”<sup>[13]594</sup>而这篇《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即可以作为蔡邕与崔瑗交往的明证。

### 3. 与刘宽的关联

刘宽字文饶,《后汉书·刘宽传》李贤注中引用谢承《后汉书》曰:“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sup>[1]886</sup>据此可知,刘宽为京氏《易》传人。《后汉书》卷54《杨赐传》记载“赐与太尉刘宽、司空张济并入侍讲,自以不宜独受封赏,上书愿分户邑于宽、济。”依此推断,刘宽和杨赐同朝为官且关系十分融洽,而蔡邕与杨赐为至交,与刘宽亦应存在交往。刘宽去世后,蔡邕撰有《太尉刘宽碑》。

### 4. 与度尚的关联

度尚字博平,关于其早年的生平,史籍中有着两种迥异的记载。范曄《后汉书》卷38《度尚传》记载道:“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而李贤注引司马彪《续汉书》则写道:“尚少丧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书》。为吏清洁,有文武才略。”<sup>[1]284</sup>结合范曄《后汉书》其他关于度尚事迹的记载及蔡邕为其所撰的《荆州刺史度侯碑》来看,谢承所言应较为符合史实。据此,唐晏在《两汉三国学案》中将其归为《易》学传人。

史籍中未见度尚和蔡邕直接交往的文字,但《后汉书》卷84《列女传·孝女曹娥》中有如下记载:“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对此,李贤注引《会稽典录》道:

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礼。时甫弱冠,而有异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饮宴,而子礼方至督酒。尚问朗碑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

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齏臼”。<sup>[1]2794</sup>

而“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即为“绝妙好辞”之隐语。由蔡邕对邯鄲淳的称誉及为度尚所撰写的碑文来看,蔡邕与度尚当有交往。

## 二

蔡邕治《易》并且与其他《易》学传人有过广泛交往,这种经学背景对其文学创作有着直接而鲜明的影响,在文本上则呈现为,蔡邕所作碑文之中使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通过对蔡邕所撰《祖德颂》、《琅邪王傅蔡朗碑》、《玄文先生李子才铭》、《汝南周巨胜碑》、《济北相崔君夫人诔》、《朱公叔坟前石碑》、《荆州刺史度侯碑》、《处士圈叔则铭》、《陈留太守胡公碑》、《司空房植碑铭》、《汉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诔》、《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胡公碑》、《太尉陈球碑》、《司空文烈侯杨公碑》、《文烈侯杨公碑》、《文范先生陈仲弓铭》、《陈太丘碑》、《司空袁逢碑》、《光武济阳宫碑》、《翟先生碑》等21篇碑文进行统计,所涉《周易》典故共计41处,其中26处出自《易传》,15处出自《易经》。对这些典故进行分类、对比可以发现,蔡邕碑颂中所涉《周易》典故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与蔡邕碑颂中所涉《诗经》、《尚书》典故相比较,蔡邕碑颂中《周易》典故取用范围较为广泛。蔡邕碑颂中所涉《诗经》典故多取自《大雅》,而对《风》、《颂》、及《小雅》部分则涉及较少。而且就取自《大雅》典故而言多集中在《文王》、《烝民》、《崧高》、《生民》、《民劳》、《常武》等几篇之中,而对其他篇目却较少涉及。就其所取用的《尚书》典故而言,多取自《虞书》,而引自夏、商、周三代之书较少。蔡邕碑颂中对《周易》典故的取用则不然,取用范围较为广泛。其中既有《易经》典故,也运用了《易传》典故。在所统计的21篇碑文所用典故之中,取自《易经》15处,具体到各卦数量如下:《蒙卦》3处,《泰卦》1处,《讼卦》1处,《复卦》1处,《家人卦》1处,《晋卦》3处,《坤卦》1处,《乾卦》2处,《观卦》1处,《屯卦》1处。取自《易传》26处,具体到各传数量如下:《文言》5处,《系辞》11处,《说卦》3处,《彖传》6处,《象传》1处。蔡邕碑颂中取用《周易》典故时呈现出的这种广泛性,和取用《诗经》、《尚书》典故时体现出的集中性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蔡邕碑颂中所用《周易》典故与《诗经》、

《尚书》典故也存在相似之处,即各碑颂所用的《周易》典故也有着多寡之别。虽然蔡邕许多碑颂都涉及到《周易》典故,但是具体到每篇之中典故数量又呈现出多寡之别。其中《汝南周巨胜碑》所涉《周易》典故最多,达到8处。其他如《太傅安乐文恭侯胡公碑》、《司空文烈侯杨公碑》、《陈太丘碑》等也都达到4处之多。与之相反,有些碑文则与《周易》典故无涉,如《陈留东昏库上里社铭》、《太尉乔玄碑》等。

蔡邕碑颂中所涉《周易》典故呈现出来的上述特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在取用《周易》典故时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所用典故有的与碑主的经学身世相契。如《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是蔡邕为其师胡广所作。其中所涉《周易》典故达到4处。胡广,《后汉书》卷44《胡广传》称他“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既然学通六经,其中当然也包括《周易》。同样,杨赐也为京氏《易》传人,蔡邕在《司空文烈侯杨公碑》中所涉《周易》典故亦达4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济北相崔夫人诔》,该碑涉及《周易》典故4处。和胡广、杨赐本人研《易》、传《易》不同,典籍中未见崔夫人习《易》的记载,但其夫君崔瑗出身经学世家,且是京氏《易》学的重要传人。蔡邕在为崔夫人撰写的碑文中运用了如此多的《周易》典故,可谓别有深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蔡邕在《陈留东昏库上里社铭》、《太尉桥乔玄碑》中均未运用《周易》典故。考察碑主身份可知,《陈留东昏里社铭》是蔡邕为虞延家族所作。虞延曾官至三公,其弟曾孙虞放也至位公卿,但是虞氏家族中并未出现著名的经学之士,与《周易》更是没什么直接关联,故其中未出现《周易》典故。而乔玄出身小吏,所习为大小戴《礼》,基本与《易》学无涉,其碑文亦未出现《周易》典故。据此可知,根据碑主研治的经典而选择相应典故,是蔡邕碑颂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处理方式使人在阅读碑文过程中,自然联想到碑主的经学身世,具有良好的效果和特殊的功用。

第二,所取用的《周易》典故与碑主的立身行事相契。《周易》同《诗》、《书》一样,于西汉初期即被确立为儒家经典。《周易》是一座储量丰富的宝藏,涉及到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蔡邕在撰写碑文时往往能够根据所涉人生事象的不同,到《周易》中取用相应的典故。

陈寔和蔡邕是同时代人,其传记见于《后汉书》卷62,他一生的经历颇为坎坷。早年任亭长、闻喜长、太丘长等基层官员,后遭党锢之祸,处于困境长达18年之久。蔡邕所撰《文范陈先生仲弓碑》称他

“鲜我显泰,既多幽否”,运用的是《周易》的《泰》和《否》两卦的典故。《周易·泰·象》称:“天地交,泰。”《周易·否·象》称:“天地不交,否。”泰是通达之象,否则是闭塞之象,前者指顺境,后者指逆境。纵观陈寔的一生,长期沉滞于微官,又遭遇十八年的禁锢,确实是少通泰,多幽否,所用《周易》典故与碑主的人生遭遇相契合。蔡邕还撰有《荆州刺史度侯碑》,碑主度尚的事迹见于《后汉书》卷38。度尚是东汉后期名将,因平定动乱有功封右乡侯。碑文称度尚“廓天步之艰难,宁陵夷之屯否”,用的是《周易》的《屯》、《否》两卦的典故。《否》卦指的是逆境,《屯·象》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宜建侯而不宁。”《屯》、《否》两卦都以艰难之象为背景,度尚所处的确实是动乱之世,与两个卦象相契。度尚又因征讨有功而封侯,与《屯》卦的卦辞“利建侯”相一致。蔡邕在度尚碑文中所运用的《周易》典故,与碑主所处的社会环境、碑主的业绩均契合无间。蔡邕所撰写的碑文中,还有几位碑主是女性。他为女性所撰写的碑文,反复运用了《周易》的同一个典故。《太傅安乐乡侯胡公夫人灵表》、《济北相崔君夫人诔》称碑主“契阔中馈”,《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称碑主“毕力中馈”。这三篇碑文所提到的“中馈”,见于《周易·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周易·家人》所说的“在中馈”指的是坤道、妇道,是妇女在厨房操持之象。蔡邕为女性所写的三篇碑文所用的“中馈”典故,道出了碑主女性身份及妇德的美好,合乎《周易》的本义。类似所引《周易》典故与碑主立身行事相契的现象,在蔡邕所撰写的碑文中比比皆是,这是他用《周易》典故时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 三

蔡邕所撰碑文大量运用《周易》典故,在此过程中,继承了《周易》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周易》本经渗透忧患意识,对此,作为阐释《周易》的《系辞》反复予以揭示:“《易》之兴,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这里一再强调《周易》本经所包含的忧患意识,把它说成是商周之际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如何按照《周易》的忧患意识立身处世呢?《系辞》作了如下概括: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

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这里把忧患意识具体化为“知几”、“见几而作”,这里的几,指的是隐微的征兆、迹象。其中的“不俟终日”,语出《周易·豫》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

《周易》中所贯穿的忧患意识要求人立身处事必须“知几”,即察危险于微末。蔡邕所撰碑文在运用《周易》典故过程中,对此多次加以昭示。《琅邪王傅蔡朗碑》称碑主“知机达要,通含神契”,这里所说的“知机”亦即知几,即洞察幽微。《汝南周巨胜碑》称周颯“识几知命”,这里的“识几”,指能够认识事物的征兆、苗头。《陈留太守胡公碑(一)》称碑主“见机而作,如鸿之翔”,赞扬他能在出现危险时迅速引身而退,保全自己。《胡公碑》称胡广“研道知机,穷理尽性”,知机,即知几,指知晓事物的先兆。《陈太丘碑(一)》对陈寔有如下赞语:

会遭党事,禁锢二十年,乐天知命,淡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黜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

这段叙述的后半部分基本是照录《系辞下》的话语,称扬陈寔洞察事物征兆的能力,具有自觉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贯穿《周易》经传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蔡邕所撰碑文承载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此而论,蔡邕所撰写的碑文可谓深得《易》之精髓。

贯穿《周易》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通变。《系辞上》称“生生之谓易”,《易》的本质是生生不已,《系辞下》又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易》是“唯变所适。”《周易》的本质及核心是变通,蔡邕深明此理,他所撰写的碑文往往以《周易》的变通之性来赞扬碑主。《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称胡广“陟降盈亏,与时消息”,语出《周易·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是赞扬胡广能够权衡利弊,与时进退。《文范先生陈仲弓铭》称陈寔“道行斯进,废乃斯止”,《陈太丘碑(一)》又赞扬他“用行舍藏,进退可度。”所谓的“用行舍藏”,语出《系辞下》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胡广和陈寔,两人的仕途经历截然不同,前者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后者先是沉滞下位,后又遭禁锢。尽管如此,蔡邕在他们身上还是看到了相通之处,即对《周易》变通理念的身体力

行。

#### 四

蔡邕所撰碑文,把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灌注其间,继承的是《周易》的传统。同时,蔡邕所撰碑文在运用《周易》典故过程中,又体现出那个历史时代的时代风尚。

《周易·蒙》卦卦辞写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条卦辞承认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可是,综观《周易》卦爻辞及《易》传,有关启蒙教育的条目极其有限,它在《周易》中不是重点展示的内容。然而,蔡邕所撰写的碑文,却反复引用有关启蒙的《周易》典故,成为这些碑文的一个重要聚焦点。《汝南周巨胜碑》写道:“蔑尔童蒙,是训是教。”这是赞扬周颯以教授生徒为乐,拒绝朝廷的征召。《处士圈叔则铭》写道:“童蒙来求,彪之用文。”这是赞扬圈典传授经术学问,使求教者受益。《文烈侯杨公碑》写道:“初潜山泽,授海童冠。后生赖以发祛蒙蔽,文其材素者,盖不可胜数。”杨赐早年隐居不仕,教授门徒,进行学问和经术的启蒙教育。同篇又称:“小子困蒙,匪师不教。”“困蒙”之语出自《周易·蒙》六四:“困蒙,吝。”《胡太傅碑》写道:“其诱人也,恂恂焉,怡怡焉,使夫蒙惑开析,愾戾优顺,逸惰能夫勤信。”胡广是蔡邕的老师,这篇碑文对于他的开析蒙惑之功予以高度赞扬,化用《周易·蒙》卦的典故。《太尉陈球碑(一)》有“凡我困蒙洒扫之”的话语,也是称赞碑主的启蒙之功。《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称:“俾我小子,蒙昧以彪。”碑主是位女性,蔡邕同样把她视为启蒙教师。

蔡邕所撰碑文援引《易》经典故,反复提及启蒙教育,反映的是东汉后期经学昌盛的客观现实。《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汉桓、灵之世,“游学增盛,至三万馀生。”仅京城游学者就多达三万馀人,再加上在各地求学的经生,数量之大,可想而知。与此相关,经师招收生徒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对此,皮锡瑞写道:

大师众至千馀人,前汉末已称盛;而《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馀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馀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馀人,比前汉为尤盛。所以如此盛者,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

可视简而诵也。<sup>[4]88</sup>

东汉经师所教授的生徒动辄数千上万,一位经师的办学规模相当于现代的一所学校。在这种情况下,经师的地位也得到提升,整个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风尚。蔡邕撰写碑文一再援引《周易·蒙》卦典故,反映的是经学昌盛所伴生的社会风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蔡邕所撰碑文援引《周易·蒙》卦典故的碑主,他们本人都有经学修养,或是与经学有关联。《汝南周巨胜碑》是为周勰而写。《后汉书》卷79《儒林传》记载,周勰的祖父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卷,四十万言。”《后汉书》卷61《周举列传》记载,勰父周举,“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周勰出身经学世家,碑文称扬他拒绝征召,“然犹存衡门讲海之乐”,他在隐居期间以教诲生徒为乐,周勰完全具有任教的能力。《文烈侯杨公碑》的碑主是杨赐。《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记载,杨赐的祖父杨震,“受《欧阳尚书》于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杨赐之父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杨秉也是一位经师,并且招收生徒。至于杨赐本人,“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杨赐和周勰一样,出身经学世家;不仅如此,杨赐的曾祖父杨宝、祖父杨震、父亲杨秉,再到杨赐本人,都有过招收门徒的经历,是一个经师世家。《胡太傅碑》的碑主胡广是蔡邕的老师,其传记见于《后汉书》卷44,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广有雅才,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sup>[1]1505</sup>可见,胡广是一位博通众经的硕儒。《太尉陈球碑》的碑主陈球,其传记见于《后汉书》卷56,其中写道:“球少涉儒学,善律令。”陈球也有经学背景,很早就接触儒学,受到濡染。《司空袁夫人马氏碑铭》的碑主是袁隗妻马伦,她的传记见于《后汉书》卷84。马伦是东汉大儒马融之女,生于经学大师之家。袁隗的传记见于《后汉书》卷45。袁氏也是经学世家,祖传《孟氏易》。综上所述,蔡邕所撰碑文援引《周易·蒙》卦典故者,其碑主除了处士圈典的事迹无法考证,其余诸人都出身于经学世家,有的还招收生徒,曾经充当经师。蔡邕运用《周易·蒙》卦的典故,把几位碑主说成是启蒙教育的楷模,可谓言之有据,事出有因,并不是凭空立言,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尊师重教的风尚。

东汉后期的《易》学传承出现一个明显的走势,对此,《后汉书·儒林列传》写道:

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东汉后期《易》学的走势是《费氏易》兴而《京氏易》衰。关于这两个《易》学流派的差异,《汉书》作了明确的记载。《儒林传》写道: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费直是《费氏易》的始祖,他对《周易》本经的阐释主要依据《易传》,是以传解经,比较忠实于原典。

《京氏易》的创始者是焦延寿和京房,《汉书》卷75对于这个《易》学流派有如下说明:“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京氏易》是以《周易》解说灾异,以天象附会人事,和《费氏易》的路数大相径庭。

蔡邕所处的东汉后期,《易》学的走势是《费氏》兴而《京氏》衰,那么,蔡邕所撰碑文在运用《周易》典故时,采用的是哪家的说法?弄清这一问题,需要把它与《京氏易》、《费氏易》进行比较而予以认定。

《琅邪王傅蔡朗碑》写道:“其选士也,抑顽错枉,进圣擢伟,极遗逸于九皋,扬明德于侧陋,拔茅以汇,幽滞用济。”这段话赞扬蔡朗为朝廷招贤纳士,提拔优秀人才。其中“拔茅以汇”用的是《周易》典故。邓安生先生解释道:“拔茅以汇:喻同道之人互相引进”<sup>[3]11</sup>,合乎碑文的原义。《周易》的《泰》初九、《否》初六爻辞皆为“拔茅茹以其汇。”《京氏易传》释《泰》卦称:“《易》云:‘泰者,通也。’通于天地,长于品汇,阳气内进,阴气升降,升降之道,成于泰象。与乾为飞伏。”<sup>[5]201</sup>《京氏易》把“拔茅茹以其汇”释为“长于品汇”,与《泰》卦爻辞本义疏离,也和蔡邕碑文所取之义相去甚远。对于“拔茅茹以其汇”,荀爽解释如下:“‘拔茅茹’取其相连,汇者,类也。”<sup>[6]175</sup>显然,蔡邕对“拔茅茹以其汇”所取的意义,与荀爽的解释相一致,也合乎爻辞本义,采用的是《费氏易》的说法。

蔡邕在3篇为女性所撰写的碑文中都用了《周易·家人》六二的典故,爻辞原文是“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这3篇碑文分别是《太傅安乐乡侯胡公夫人灵表》、《济北相崔君夫人谏》、《司徒袁公夫人马

氏碑铭》。称前两位碑主“契阔中馈”,称第三位碑主“毕力中馈”,含义相同,都是在厨房操持饮食之事。对于《家人》的六二爻辞,《京氏易传》解释道:“酌中之义,在于六二,与离为飞伏。”<sup>[5]204</sup>用语含混没有道出这条爻辞的本义。荀爽作的解说如下:“六二处和得正,得正有应,有应有实,阴道之至美者也。坤道顺从,故无所得遂。供肴中馈,酒食是议,故曰‘中馈’。”<sup>[6]352-353</sup>荀爽的解释贴近爻辞本义,也是蔡邕撰写碑文时所取的意义,用的是《费氏易》的解说。

蔡邕所撰《文范先生陈仲弓铭》,碑主是陈寔。碑文称陈寔“含章直方”,用的是《周易·坤》卦的典故。《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坤》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蔡邕把这两条爻辞整合在一起,用以称赞陈寔内含美质,为人处世耿直方正。对于《坤》卦的这两条爻辞,《京氏易传》作了如下解释:“六二内卦,阴处中,臣道正也,与乾为飞伏。宗庙居世,三公为应。未免龙战之灾,无成有终。”<sup>[5]200</sup>京房对《坤》卦六二、六三爻辞的解释,都没有直接触及“直方大”及“含章”的意义,和后来蔡邕撰碑文的用典不存在关联。再看,荀爽对这两条爻辞所作的解释:

“直方大”,《乾》之唱也。“不习无不利”,《坤》之和也。阳唱阴和而无所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六三阳位,下有伏阳。《坤》,阴卦也,虽有伏阳,含藏不显。以从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sup>[6]90</sup>

荀爽根据爻位和爻象加以解说,道出了“直方大”及“含章”的内涵,和蔡邕运用这两个典故所取的意义相契。

荀爽的《易传》保存下来的条目,和蔡邕所撰碑文中《易》典故能够参照的数量有限。尽管如此,通过上述对照仍然可以看出,蔡邕所撰碑文的《周易》典故,所取的是《费氏易》,而不是《京房易》。蔡邕对《易》学的这种取舍,体现出当时经学的基本走势。《费氏易》的特点是以《易传》解释《易经》,比较切合《周易》本经的含义,显得平实可信。而《京氏易》则牵强附会甚多,已经陷入神秘主义。东汉后期《费氏易》兴而《京氏易》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碑文追求凝重典雅,而《费氏易》的平实可信,客观上适应了碑文风格的需要。除了当时经学走势的驱动,蔡邕撰写碑文取《费氏易》而舍弃《京氏易》,文章本身基本风格的规定也起了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王国维. 观堂集林[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3] 邓安生. 蔡邕集编年校注[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4] 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 京房. 京氏易传[M]//《诸子集成补编》(8).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 [6] 李道平. 周易集解纂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On Zhou Yi Allusions in the Inscription on a Tablet by Cai Yong

ZHAO Debo

(The Institute of Non-orthodox Cultur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cribe Eastern Han Dynasty, Cai Yong had close associations with the disciples of the teachings of Zhou Yi at that time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its dissemination. He used many allusions of Zhou Yi in the inscription on a tablet, and made different choices according to the identities of the owners of the tombstones. These allusion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awareness of adversity and the concept of flexibility of Zhou Yi, but also reflected the respects and esteems held for teachers and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lourishing studies of scriptures. Feishiyi, as used by Cai Yong in his tablet, accord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Zhou Yi in that period.

**Key words:** inscription on a tablet by Cai Yong; Zhou Yi allusions; social customs; development trend of Zhou Yi

[责任编辑:孟青]